

· 年度综述 ·

2012 年清史研究综述

李立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2 年度清史研究稳步推进,在政治方面,以制度与法律的研究为重点;经济方面,对赋税与工商业的研究热度不减;而学术方面,则较注重学术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的有机结合。总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学术观点的争鸣。如何龄修《读“争抢”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清史论丛》2012 年号)对柳敬亭的原名和祖籍问题做了考察,并评介了其学术成就,指出今人对名人籍贯的争抢有违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上海书店出版社)分别对孟森、王钟翰诸先生的“雍正篡位说”提出了质疑。钟玉发《徐光启与阮元科技思想之比较》(《清史论丛》2012 年号)探讨了所谓“明清时期科技落后”的问题。

其二,新材料的运用与新观点的提出。如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一直受到清史学者的重视,孟森先生在《科场案》一文中,搜集了大量有关此案的史料。此后许多学者的相关著述所运用的材料,皆不出其范围。而白亚仁《从〈吴兴大事记〉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清史论丛》2012 年号)则利用《吴兴大事记》中的诸多新材料,考察了顺天丁酉乡试“贿赂公行”的社会根源、科场案株连者流徙后的遭遇等问题。此外,徐道彬《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安徽史学》2 期)考察了戴震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的史学理论成就。杨朝亮《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齐鲁学刊》4 期)分析了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的影响。

其三,重视清史传统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如陈鸿森《〈清史列传·儒林传〉续考》(《中国典籍与文化》1 期)对余萧客、陈祖范等十二人之传做了考证。谢贵安《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 期)对《清实录》的史料来源做了梳理与考察。其中档案资料的整理成果颇丰,主要有韩永福《乾隆

朝书院档案》、哈恩忠《开办大清邮政档案》、高换婷《光绪年间治理永定河档案》、郭美兰《乾隆朝绥远城设立八旗官学满文档案》等。杨珍《关于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故宫学刊》第8辑)则从澄清史实、补充清代重要人物及清宫女性事迹、彰显满洲特色等八个方面对清史研究中满文档案的作用做了系统考察。

此外,在“新清史”方面,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强调了中国内部因素的民众史、全球背景下的经济史等共八个专题。定宜庄、胡鸿保《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清史论丛》2012年号)从有关新清史译文入手,讨论了对“民族”、“种族”、“国家”等重要术语翻译的相关问题。刘凤云等《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4期)、徐凯《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崔岩《从乾隆诗看清帝国的汉化》(《云南社会科学》5期)等则是继续对新清史的某一问题予以回应。

本年度重要的学术会议有:韩国高丽大学举办的以“灾害与东亚”为主题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四届年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古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海判南天’与康熙时代天文大地测量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以下将分专题介绍本年度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

一、政治

综合:许曾重《许曾重史学论文选集》(故宫出版社)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清史分期,“康乾盛世”,边疆,农民的反抗斗争和起义,历史人物,以及“清初三案”等问题。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湖南人民出版社)揭示了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林乾《康熙惩治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揭示了康熙一朝的朋党现象及其本质。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对嘉庆、道光两朝政治危机的表象、原因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李文海《清代官德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描绘了清代官场的众生相,揭示了清廷的黑暗与腐败。高翔《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述了满汉文化冲突与清初社会重建、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前期政治演变方向等问题。

杨珍《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康乾两帝刍议》(《紫禁城》8期)分析了康熙、乾隆两帝的为政特色及其对清代历史的影响。杨珍《紫禁城与清代宫廷史》(《人文北京与文化创新能力建设: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出应重视对“紫禁城人”的多角度考察,兼用满汉文史料。吴伯娅《君臣恩怨——康熙帝与赵申乔》(《明清论丛》

第12辑)探讨了康熙帝及清代政治史的相关问题。单卫华《论清初的廉政建设》(《东岳论丛》7期)论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廉政措施及其意义。苟晓敏《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及其成因论析》(《中华文化论坛》3期)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的成因。陈连营《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人民出版社)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解读。

制度: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清代贡物制度体系的进贡方式、定例及处理流程等进行了论述。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探讨了王朝统治文化的变化及其政治动因。王海燕《帝国的象征:清东陵的政治——社会史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清代陵寝制度、陵寝工程、护陵制度与纠纷。李永贞《清朝则例编纂研究》(世界图书出版上海有限公司)阐释了清朝在会典与则例编纂方面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宗韵《清代恩科的确立及其成因——以〈万寿盛典初集〉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从统治者、士子的角度,分析了清代恩科出台的原因。薛刚《清初文官考满制度论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清初文官考满制度最终确立了以京察、大计为主的考核制度。孙静《清代佐领抬旗现象》(《史林》2期)认为抬旗现象是满洲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安徽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明清时期徽州地方保甲编制的特点。欧磊《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北方论丛》6期)阐述了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特点及历史意义。王璋《乾隆朝山西义仓初探》(《历史档案》3期)考察了乾隆时期山西义仓的制度设计、仓储规模、社会功效。滕德永《嘉庆朝御赏贡参制度》(《历史档案》2期)认为御赏贡参制度是清廷控制京师官员的一种手段。赵永翔《清代“重赴鹿鸣宴”制度》(《历史档案》2期)阐述了“重赴鹿鸣宴”制度的政治意义。方兴《清代陵寝与堪輿: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江汉论坛》11期)揭示了陵寝与堪輿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意义。高月《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期)论述了清代东北地方政制变革的意义。王秀玲《清代太庙祭祀及其政治象征仪式》(《清史论丛》2012年号)考察了清代太庙祭祀的仪式及相关规定。张楠《论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的孝观念》(《中州学刊》5期)论述了“孝”在清代官僚制度中的作用和意义。常建华《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明清论丛》第十二辑)认为清代保甲制度的大规模推行始于康熙四十年代后期,且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职官与行政:苗月宁《清代两司行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清代两司的基本职掌。王志明《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清代知府与京官一体化倾向》(《史学集刊》6期)认为京官与地方官双向迁转,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和行政职能的体现。周勇进《清代道员职衔考述》(《清史研究》2期)考述了清

代道员职衔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龚小峰《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安徽史学》4期）考察了地域因素在地方政权掌控中的作用。许静、赵亮《嘉庆朝官员革职特点研究》（《清史论丛》2012年号）分析了嘉庆朝官员革职的原因及特点。王雪华《清代吏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武汉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清代吏胥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及其对清廷政权的影响。苟德仪《清代道台衙门的书吏与差役——以川东道衙为考察中心》（《历史档案》2期）揭示了道台衙内部机构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王景泽《清初顺治朝总督之属籍》（《社会科学战线》1期）对清代顺治朝总督的属籍作了一一澄清，指出清政府对汉族总督的任用是清初政权得以稳定的基石。刘丽君《论清代康熙朝科道官对储位问题的关注》（《甘肃社会科学》4期）认为科道官对康熙朝储位问题持反对态度，导致了科道官权力的削弱。李嘎《雍正年间晋北地区的政区改革与行政经营——以新设朔平府为例》（《山西师大学报》4期）认为朔平府的建置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双赢。

法律：何小平《清代习惯法：墓地所有权研究》（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清代墓地所有权的取得、权能以及消灭。廖斌《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探讨了该地区的刑事司法主体、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证据制度和实践、刑事审判制度。李青《清代档案与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探讨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律及其与刑事诉讼的区别。王巨新《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人民出版社）叙述了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与涉外法的渊源。

许颖《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河北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清代钦差大臣的司法权对地方官员的约束作用及其局限。周蓓《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量化分析》（《学术界》1期）阐述了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及官府的策略。阮氏秋水《越南阮朝〈皇越律例〉与〈大清律例〉的异同》（《江汉论坛》4期）比较了两书在结构、律文和条例内容等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李典蓉《〈清史稿·刑法志〉史源问题探析》（《清史研究》4期）论述了《清史稿·刑法志》与清史馆未刊稿的区别与史源，及其与清代《刑法志》体裁与思想的异同。陈兆肆《清代永远枷号刑考论》（《清史研究》4期）探讨了清代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刑罚的“自发转型”问题。姚上怡《清代学政、教官司法职能探析》（《云南社会科学》4期）阐述了清代学政及教官的特殊司法管辖权与其形成原因。许燕婵《清朝旗人的法律特权及其影响》（《湖北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旗人”在清朝社会中享有的法律特权及其社会影响。胡祥雨《“逃人法”入“顺治律考”——兼谈“逃人法”的应用》（《清史研究》3期）对逃人法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作用作了考察。毛立平《“妇愚无知”：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清史研究》3期）探讨了清代嘉道时期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意识。郑小春《清代的基层司法审判实践：

苏氏诉讼案所见》(《清史研究》2期)揭示了清代基层司法审判制度与实践的背离。张世明《议罪银新考》(《清史研究》1期)认为乾隆朝的议罪银制度是清代司法体制变迁的转折点。

事件: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揭示了清代官场的陋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金性尧《清代笔祸录》(上海远东出版社)对发生在清代统治期间的多次“文字狱”作了剖析。

鱼宏亮《重建观念史图像中的历史真实》(《东亚观念史辑刊》)对观念与历史事件互动的历史解释模式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孙明《乾隆朝盐务“三案”对盐官和盐商的处理》(《历史档案》2期)揭示了清代盐商与皇权间的关系。曹江红《卢见曾、纪昀与两淮盐引案》(《清史论丛》2012年号)分析了卢、纪在两淮盐引案后的际遇。冉耀斌《丁酉科场案与清初秦陇文人心态》(《西北师大学报》6期)认为丁酉科场案引发了秦陇士人的抗清情绪。王妍《乾嘉时期辞官现象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期)揭示了汉族官员辞官的原委。李军《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北方论丛》6期)探讨了清代学政的弊端。吴伯娅《卫匡国笔下的明清易代——〈鞑靼战记〉初探》(《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梳理了卫匡国关于明清易代的观点。

军事:邱捷《清朝前中期的民间火器》(《社会科学研究》2期)阐述了该时期民间武器流散的格局。徐美洁《清初四明山寨粮饷问题及遗民心态的转变》(《史学集刊》5期)揭示了宁波一地遗民心态的演变。张建《康熙五十九年乌兰呼济尔之战浅探》(《清史论丛》2012年号)从清军军事信念的建立与清俄边界之形成等方面对乌兰呼济尔之战做了评价。刘冬梅《清初海南黎族勇武抗清原因分析》(《史学集刊》6期)认为清统治者在军事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缺失,导致了海南岛黎民持续的抗清运动。毛宪民《清代射箭与“弓力”问题》(《清史论丛》2012年号)探讨了八旗官兵在军事训练中对射箭“弓力”力数确定的问题。谢景芳《清入关前决定满族命运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战线》1期)分析了皇太极确定争夺全国政权意图的发展过程。王希隆《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对张格尔之乱的成因、影响作了探究。周喜峰《清初黑龙江各族与雅克萨保卫战》(《明清论丛》第十二辑)阐述了清朝初年黑龙江各族在雅克萨战争中的作用。

二、经济

财政与赋税:申学锋《转型中的清代财政》(经济科学出版社)探讨了清代财政改革的制度及相关的政治文化因素。〔日〕山本进《清代社会经济史》(山东画报出

版社)论述了中国被迫纳入全球化之前清朝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高王凌《乾隆十三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叙述了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和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等问题。

魏光奇/《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河北学刊》6期)认为清廷未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是导致赋役催征诸弊病的根本原因。陈支平《明清港口变迁史的重新解读——以泉州沿海港口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考察了政府对于泉州港口的管理和征税。

农业与漕运:薛理禹《清代屯丁研究:以江南各卫所及归并州县屯丁为例》(《史林》2期)阐释了清代屯丁编审、屯丁银编征制度的变化。吴小珍《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清史研究》3期)考察了湘南地区粮食生产与供求的变动及其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邓玉娜《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的历史地理学解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分析了地理因素对清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的影响。陈瑶《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厦门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清代前期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竞争关系。彭志军《试论清代婺源土地的税租化——兼谈清代卖田契中的土地表述问题》(《南昌大学学报》3期)认为婺源土地买卖契约的“租税化”,是自明末一条鞭法改革以来赋税和土地紧密结合的结果。叶美兰《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南京社会科学》9期)分析了京杭运河漕运对沿岸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

工商业与国内贸易:刘朝辉《嘉庆道光年间制钱问题研究》(文物出版社)考察了清代嘉、道年间制钱概况及钱币流通的历史。王琳《清代河南北舞渡镇的金融业——以新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清代北舞渡镇金融业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燕红忠《清政府对牙行的管理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4期)认为清代牙行是政府管理市场和民间商业的一种间接手段。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清史研究》1期)通过乾隆时期“伪孙嘉淦奏稿案”的传播,分析了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之间的关系。

手工业:张洪林《清代四川盐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阐述了清代盐法的流变及四川井盐的生产、运销、征税。陈瑶《从汉口到湘潭——清初湘潭县重建过程中的徽州盐商》(《安徽史学》4期)论述了徽州盐商在清初战乱时期对湘潭县商品经济发展的贡献。张研《乾隆盛世的市场与徽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乾隆年间徽商的社会角色。

铁源、溪明《清代官窑瓷器史》(中国画报出版社)论述了清代官窑的制作过程,以及与瓷器相关的祭祀陵寝、婚嫁丧葬、寿庆赏赐等制度。常建华《康熙朝开矿问题新探》(《史学月刊》6期)梳理了康熙朝开矿政策的意义。马琦《清代前期

矿产开发中的边疆战略与矿业布局——以铜铅矿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清廷“开边禁内”思想成为矿业开发的政策导向。

水利工程：刘文远《清代水利借项研究（1644—1850）》（厦门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清代水利借项缘起与发展、帑项借动与支出、借项归还与蠲免、借项的管理及其局限等问题。〔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的历史贡献。庄宏忠、潘威《清代志桩及黄河“水报”制度运作初探——以陕州万锦滩为例》（《清史研究》1期）论述了清代万锦滩志桩的设立过程、制度规定，以及在“水报”中的配置和作用。

三、社会

宗族：冯尔康《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世纪的宗族批判论》（《安徽史学》2期）认为清代的宗族具有大众性、自治性、互助性、民主性、宗法性、依附性。徐凯《满洲氏族、谱系文化与本部族认同初探（一）、（二）》（《辽宁大学学报》5、6期）认为乾隆初期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强化了满族的自我意识，是满洲本部族认同的一部“法典”。朱平《清代徽州宗族维护血缘秩序的主观努力——以新发现的三通碑刻为例》（《安徽史学》3期）对清代徽州宗族维护本族血缘秩序的活动与意义做了研究。常越男《赫舍里氏“巴克什”家族与清初政治文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巴克什”家族在绥服蒙古、创立满文、编纂典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振满《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学术月刊》4期）揭示了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的历史渊源。

灾荒：成积春《康熙帝救荒思想初探》（《明清论丛》2012年）认为康熙四十二年之前持“耕九余三”论，其后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应对自然灾害的救荒思路。倪玉平《清代冰雹灾害统计的初步分析》（《江苏社会科学》1期）梳理了清代冰雹灾害并对其特点做了探讨。于春英《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5期）分析了清代东北地区水灾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李长莉《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江海学刊》1期）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等三个典型救灾案例的考察，认为清中后期救灾体制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

宗教：冯尔康《“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8期）探讨了康熙帝对天主教义的认同问题及其招揽西士之风中断的原因。孟繁勇《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满洲宗教信

仰的多元化趋势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起到了促进作用。张中鹏《雍正元年京官条陈禁教探析》（《暨南学报》1期）揭示了雍正元年京官禁教奏折之性质及其历史意义。

郭丽娜《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学苑出版社）运用了一些新材料，对清乾隆、嘉庆年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的活动做了研究，认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无视文化差异的保守传教模式，为后来激烈的民教冲突埋下导火线；郭丽娜、蓝燕《清代中期下层传教路线在四川的确立和实践》（《暨南学报》1期）认为下层传教路线在禁教时期为教会争取到一定的生存空间。

社会生活与民俗：林存阳《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及践履》（《清史论丛》2012年号）认为清廷对礼的建构和规范体现出“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李娜《〈乾隆休宁黄氏家用收支帐〉中所见清中叶徽州民间礼俗》（《清史论丛》2012年号）对清代中叶徽州民间礼俗生活作了探讨。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房产交易中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清代前期北京住房的双轨制及其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吴正东《清代湖南婚姻礼仪消费及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清代湖南的婚姻礼仪消费表现出逾越礼制性、奢侈性和婚嫁论财性等特征。常建华《康熙制作、赏赐松花石砚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考察了康熙年间松花石砚的制作发展过程，揭示了清代特有的政治文化。

郭松义《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初形成了旗人居内城、汉官和商民居外城和城郊的基本居住格局，但当统治者完成迁居之时，现实又使其向相反方面行进。赵广军《清初台湾“土番”屯垦河南邓州考述——兼论小聚落移民民俗之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期）考察了河南邓州的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以及风俗遗留等问题。

贾建飞《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述了乾嘉道时期清廷对内地人口向新疆流动的认识和管理政策及内地人口在新疆的社会经济活动。刘凤云《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政治体制对城市特别是都城的重要影响。谢秀丽、韩瑞军《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总结了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的特点与作用。

环境与生态：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对构成清代围场体系的各围场与行围制度的梳理，论证了国家对围场资源的干预、组织和调控。王建革《清代东太湖地区的湖田与水文生态》（《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代东太湖地区湖田水文生态通过植桑养蚕等，维持了传统江南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李懋君《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行政引导》（《湖北社会科学》8期）考察了清政府在“湖广填四川”中的角色及其意义。

四、学术与文化

综合：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运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源流嬗变，分析了学术演进与世运变迁、政治文化导向等之间的密切联系。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分析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研究的意义，梳理了清代学术史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贡献。王记录《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学习与探索》8期）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角度论述了学术之嬗变。梁仁志《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明清徽商的发展调和了当时社会的义利关系和贾儒关系，推动了明清儒学的世俗化发展。

学术思想与流派：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从学术思想、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皖派”学术由“小徽州”到“大徽州”的扩散轨迹，拓展和加深了徽学研究视域，对清代学术乃至传统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丁进《“皖派经学”观念的形成及其经学史意义》（《湖南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皖派经学的起源、学术特点与意义。吴晓番《乾嘉思想的伦理新向度——以阮元、凌廷堪为中心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乾嘉思想的伦理向度是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一环。刘玲《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史学史研究》1期）分析了乾嘉学者对“经世致用”的诉求。

朱昌荣《清前中期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新探——基于〈朝鲜王朝实录〉的考察》（《史学集刊》5期）以《朝鲜王朝实录》为基本史料，探讨清前中期李氏朝鲜对明奉行“义理”思想的表现与特点。张寿安《清代徽州义理学的产生及其重要性——一个地理与文化的观察》（《湖南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乾嘉学者对义理学的态度、徽州义理学之产生及其特色。王胜军《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中州学刊》2期）认为孙奇逢与张履祥推动了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的形成。

钱志熙《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梳理了浙东学术发展的基本进程，论述了其于伊、洛理学及陆、王心学的渊源关系。

典籍：文廷海《清代前期〈春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清代经学学统重建的学术视角，指出清代前期《〈春秋〉》学的特色是向传统的回归。谭德兴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期)在文字、名物制度、史实方面对清代金文与《诗经》做了对比研究。邓声国《试论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特色及其成就》(《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8期)将张尔岐的《仪礼》置于清初礼经诠释史的背景下考察,发掘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顾迁《敖继公〈仪礼集说〉与清代礼学》(《史林》3期)认为敖继公与郑玄的立异处往往有其根据,不背实事求是之旨。邓声国《吴之英之〈仪礼〉礼图研究探析》(《清史论丛》2012年号)探讨了吴之英在礼节图、礼节图表、宫室图和器物图等研究方面的特色。曾光光《〈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史学理论研究》3期)从学术批判的角度分析了《汉学商兑》的特点与不足。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1期)将清代学者对《禹贡》的研究分为注疏型、集解型、辑注型、专论型、泛说型五类,并总结了其学术特点与价值。安东强《〈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及反响》(《中山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该书的编纂缘起、流传及社会反响。谷敏《天一阁藏黄宗羲〈明文案〉再探》(《清史论丛》2012年号)考察了现存《明文案》的版本源流,认为天一阁所藏本中的朱笔批语当为多人过录的黄宗羲批语。

张安东《清代安徽方志研究》(黄山书社)考察了清代安徽方志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杨绪敏《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学习与探索》5期)分析了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的特点与经验。童杰《郑若曾〈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期)揭示了《筹海图编》在明代海防史、中日交通史、历史地理学、科技史等方面的史学价值。吴伯娅《陈昂父子与〈海国闻见录〉》(《清史论丛》2012年号)考察了陈氏父子的生平事迹及《海国闻见录》的特色;《日心地动说的传入与〈地球图说〉的出版》(《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考察了《地球图说》的出版与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入。侯德仁《清朝官修西北边疆史地著作的学术成就》(《苏州大学学报》3期)考察了清朝官修西北边疆史地学著作的学术价值。

蔡东洲等《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华书局)揭示了清代四川省南部县县衙文书档案的文献学、历史学价值。段自成、李景文《清代河南巡抚衙门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认为河南巡抚衙门档案有助于了解清代地方政务的施行情况及清代巡抚衙门的行政运行机制。吴冬冬《乾嘉年间徽商汪氏信札的整理及研究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徽商的家庭生活及徽商与封建地方官场的互动。

刘蕾《天禄琳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探讨了该书在中国目录学史、版本学史上的价值。伍媛媛《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黄山书社)论述了清代补史艺文志在图书分类、体制结构的特点与学术价值。胡文生《〈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研究》(《河南社会科学》7期)分析了两书在体例、书目的选择与分类、著

述思想等方面的不同。罗琳《〈四库全书总目〉“永乐大典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认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并没有完整地全部过录386种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之典籍,作者对其得失做了评价。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学术立场差异考论》(《文史哲》6期)认为《荟要提要》对宋代理学及朱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多有肯定,而《总目》则对汉学过度颂扬,对宋学多所贬抑。崔富章《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文献》3期)比较了七阁库书提要、七阁《总目》提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书》所载《提要》之优劣。佟大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献辨伪学成就研究》(《明清论丛》第十二辑)考察了《四库总目提要》在辨伪规模、辨伪方法、辨伪理论的成就。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中心等《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清史编纂中的纂修纪实与方法、史实与文献考订、学术书评等内容。崔军伟《康熙朝“三朝国史馆”存续时间及成书问题举证》(《历史档案》3期)考证了“三朝国史”馆存续的时间及其纂修成果;《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史学史研究》3期)指出了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的价值与不足。毛春伟《简析乾隆皇帝评“三通”》(《天津社会科学》2期)分析了乾隆帝对“三通”的评论及其史学意义。刘凤强《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史学史研究》3期)揭示了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史书编纂旨趣、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新变化。辛德勇《简论清代中期刻本中“方体字”字形的地域差异》(《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认为乾隆中期以后方体字已经开始全面确立了清人自己的风格。李士娟《雍正朝内府刻书概略》(《历史档案》1期)对雍正朝内府刻书情况及其特点做了考察。屈宁《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文杂志》5期)认为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与传统。

学术人物及其思想: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岳麓书社)分皇帝、名臣、文人、女性四目分别做了考述。沈雨梧、陈思玉、贾沛娟《清代科学家》(光明日报出版社)阐述了清代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贡献。李贵连《清代满人经学成就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论述了清代满人在《五经》、《四书》,尤其是易学方面的成就与影响。

佟永功《满族的历史文化名人——达海》(《清史论丛》2012年号)强调了达海在满文改革和翻译汉文典籍方面的贡献。杨绪敏《论钱谦益与明史的修撰与考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钱谦益对元末明初史事的编纂和考证,对清初乃至乾嘉考据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陈祖武《陈恭甫先生之人格与学术精神》(《闽江学院学报》1期)考察了福州先贤陈恭甫先生的高尚人格与其修身立学的品质,论述了其学术贡献。林忠军《论

顾炎武易学思想与清代易学转向》(《东岳论丛》6期)论述了顾氏在易学研究中倡导的求实精神和考据方法。王小恒《从全祖望与杭郡赵氏两世交谊看其盛世“遗民”心态》(《西北师大学报》6期)揭示了清初浙派学者的文化价值和人格特征。吴振亚《颜元生命哲学思想论略》(《中华文化论坛》6期)对颜元生命哲学的宗旨作了解析。肖建原《王夫之对儒、佛、道心理思想关系的辨析》(《中州学刊》3期)揭示了王夫之“空”、“无”认识论的根源。张学智《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复旦学报》4期)对王夫之易学中的“乾坤并建”思想做了诠释。汤城《王夫之论史文繁简》(《安徽史学》3期)探讨了王夫之在论史文繁简方面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刘盛《清初关于王学思潮讨论的历史反思》(《明清论丛》第十二辑)分析和评价了影响清初讨论王学思潮形成的因素。

徐道彬《戴震礼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清史论丛》2012年号)认为戴震的理学思想开启了清中后期凌廷堪、阮元等人“以礼代理”思想的先路。余亚斐《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北方论丛》1期)考察了戴震“理存乎欲”的思想。崔亨植《戴震“人欲肯定”论与“无私”主张的思想意义》(《东岳论丛》9期)认为戴震的人欲论有助于调和社会矛盾。邓国宏《戴震“以情絜情”说辨析》(《安徽大学学报》5期)认为戴震的“以情絜情”说是一种检验道德的思想程序。王明兵《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求是学刊》6期)认为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等“实学化”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抨击。

阳欣《段玉裁“定是非”校勘思想探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段玉裁校勘理论的渊源、成就与不足。鲁一帆《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河北学刊》4期)梳理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孟永林《乾嘉学者张澍姓氏学刍论》(《社会科学战线》5期)分析了该书在厘清订正中国古代姓氏错乱方面的价值。宋铁全《王念孙、王引之诂正段氏〈说文注〉失误例说》(《福州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成就与不足。林忠军《毛奇龄“推移”说与清代汉易复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毛奇龄在易学方面的成就开清初考据学之学风,对于清中后期乾嘉学派形成和汉易鼎盛产生了重大影响。孙邦金《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期)揭示了乾嘉考证史家群体隐藏的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廖晓晴《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文史哲》4期)认为章氏“史意”的内涵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陈其泰《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河北学刊》1期)认为“道”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思想,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杨丽容《论惠士奇在广东的交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认为惠士奇在广东的交往开拓了清代岭南中后期文化的新路。曹江红《惠栋与卢见曾幕

府研究》(《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卢见曾幕府为惠栋提供了学术研究场所,而惠栋的汉学思想对于卢见曾认可理解清代汉学亦有深刻影响。

钟玉发《徐光启与阮元科技思想之比较》(《清史论丛》2012年号)讨论了所谓“明清时期科技落后”的问题。董少新《论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以南京教案为中心》(《史林》1期)探讨了徐光启的科学家、教徒和政治家等身份。徐道彬《论江永与西学》(《史学集刊》1期)和《论凌廷堪与西学》(《安徽大学学报》3期)二文,通过江永和凌廷堪对“西学中源”说的反对,借以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以及传统学者在特定时代所展示出的学术品格与精神境界。

文化政策与职能:李娜《清初南书房与京城文化》(《人文北京与文化创新能力建设: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论述了清初南书房的设置对清代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朱文佳《雍正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浙江社会科学》6期)剖析了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高远《清初文化秩序重建与〈宋史〉改修》(《北方论丛》2期)认为清初学人改补《宋史》最终构成了清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念基础。吴延溢《清官文化的辩证解读》(《湖北社会科学》11期)分析了清官文化存在的两种体制及其形成原因与历史影响。王云松《论清初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翰林院在推动清初社会秩序重建、促进学术文化繁荣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学校与教育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续)》(万卷出版公司)对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以及实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刘虹等《清代直隶科举研究》(科学出版社)考察了清代直隶科举的相关制度、案例。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清代科举冒籍的类别、缘由与社会影响、冒籍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效果等进行了研究。胡平《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探讨了科举考务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清代的科举考试及管理等问题。

谢海涛《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考论》(《史林》5期)考述了八旗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及其发展变化。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史学月刊》10期)梳理了清代大挑举行的时间、次数,分析了其前后变化的原因;他的《再论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历史档案》2期)考察了大挑制度定制前举人入仕之法及大挑举人的出路等问题。马镛《清代科举的官卷制度》(《历史档案》3期)对清代

科举中官卷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贾建飞《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广东社会科学》1期）论述了科举制在新疆部分地区的实施和发展，及其出现的问题。杨歌《清朝嘉庆年间地方学额纷争处理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6期）探讨了清代地方学额纷争的原因与影响。刘虹《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湖南大学学报》2期）从顺天贡院、考生、考官三个方面论述了顺天乡试的特色。沈俊平《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武汉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的价值与影响。吴惠巧《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河北学刊》5期）认为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鼓励与支持，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王衍军《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齐鲁学刊》5期）分析了清初在教育 and 科举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宋元强《清代的召试》（《明清论丛》第十二辑）探讨了清代召试制度的演变与意义。房德邻《清顺治朝“三遇恩诏”考》（《明清论丛》第十二辑）厘清了顺治朝三次恩诏的具体所指及其产生始末。

六、民族与边疆建设

李凤珍《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读清史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探讨了清代西藏世俗领主执掌统治权时期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揭示了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西藏地方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变化对执政体制的影响。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系统研究了清代西藏和布鲁克巴（今不丹）宗藩关系的建立、完善及衰落。杨恕《评清朝的西藏政策》（《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为近代西藏分裂主义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张中奎《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清廷在“新疆六厅”进行改土归流和苗疆再造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作了深入分析。白京兰《清代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法建设——以清代新疆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6期）分析了清政府在治理新疆过程中，国家制定法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权威与主导地位。贾建飞《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新疆内地坛庙的兴起，是清廷加强新疆统治的表现之一。李文浩《清代以来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期）认为清代以来东疆地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民居聚落文化中心，促进了民族融合。

罗春寒《平埔族群的民族认同再论——以康雍乾时代台湾土地开垦及民族政策为讨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9期）认为清代台湾平埔族的汉化促进了民族关

系的融合发展。贾宁《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清史研究》3期）阐述了西宁办事大臣在青海行政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马亚辉《乾隆时期云南之城垣修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乾隆时期云南城垣的修筑起到了捍卫边疆、巩固边防的作用。熊昌锟《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清代广西建立的宾兴组织，促进了地方教化，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衣长春《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1期）认为雍正“大一统”观是对孔子以来“大一统”理论的超越。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理》（《清史论丛》2012年号）探讨了顺、康时期对南方土司的政策及其意义。方铁《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河北学刊》3期）以云南、贵州两省为重点，讨论了清雍正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相关问题。

李治亭《清代满（洲）族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辽宁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满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及功绩。廖晓晴《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辽宁大学学报》5期）认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二年，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N. 哈斯巴根《清初达尔汉名号考述》（《清史研究》2期）考察了达尔汉号的源流。刁书仁《努尔哈赤崛起与东亚华夷关系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崛起对东亚华夷关系的影响。赵柄学《噶尔丹死亡考》（《历史档案》2期）考订了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的死因、死亡日期、噶尔丹骨灰及其女钟察海入降清朝的时间。

七、中外关系

中外交流：廖敏淑《清代中国的外政秩序：以公文书往来及涉外司法审判为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探讨了清朝传统对外观念下固有外交的运作机制。〔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以清代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帆船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考察了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其对周边藩属的意义。乔飞《从清代教案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清季教案发生的阶段、特点及其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影响。

吴伯娅《顺治帝与汤若望》（《紫禁城》1期）揭示了顺治帝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她的《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科学与艺术活动》（《人文北京与文化创新

能力建设：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梳理了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与意义。李华川《国家秩序与个人信仰——十八世纪一位本土教士的困境与策略》(《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考察了国家秩序对个人信仰的关系。陈国保《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期)揭示了越南所推行的“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

陈冰冰《〈四库全书〉与李氏朝鲜后期的文坛动向》(《清史研究》2期)认为《四库全书》对朝鲜后期的文体改革、朝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薛明《清入关前的对日认识》(《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在入关前对日本的认识主要是借助朝鲜提供的各种日本情报而形成的。王士皓《晚清时期中国和秘鲁建交过程初探》(《清史论丛》2012年号)认为晚清中国和秘鲁的建交过程是双方在近代外交平台上博弈的结果。吕颖《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清史研究》3期)阐述了洪若翰在华传教活动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对外贸易：曹雯《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清史研究》3期)论述了粤海关的征税状况及行商的责任、外商对广州贸易结构的抵制。叶柏川《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清史研究》1期)考察了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中的作用。陈志刚《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及其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期)揭示了南亚贸易格局对清廷控制西藏的作用及其影响。王巨新《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清廷所制定的对东南亚贸易政策是对旧有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